

革命与抒情：近代潮汕报刊文学图像研究

李国平^{1*}，陈奕君¹

(¹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晚清西式铅石印刷术传入岭东沿海，潮汕报刊业兴起，报刊文学图像随之兴盛。文学图像具有革命性、抒情性特征，既有针砭立宪敷衍、官僚腐败的政治讽刺画，亦有历史事件、个人抒情性的图景，表征出清末立宪危机、黄冈起义、同盟会革命思想等图像旨趣。这些文学图像采用漫画、照片的形式，对晚清官场、社会怪现状、西方生活场景描绘与介绍，起到革命、抒情双重功用。近代“汕头埠”图式，意在启迪明智、激发思想，引入西式器物，促使近代潮州社会向现代化演进。

关键词：潮汕；文学图像；革命与抒情；近代

DOI：<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2.1601>

Revolution and Lyr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Images in Modern Chaosha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Li Guoping^{1*}, Chen Yijun¹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relief- and litho-printing techniques to the Lingdong coast in the late Qing, the Chaoshan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industry arose and literary images in the press flourished. These images bear both revolutionary and lyrical features: political satirical cartoons censuring the perfunctory handling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s well as scene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rsonal lyrical sentiment, manifesting such pictorial concerns as the late-Qing constitutional crisis, the Huanggang Uprising,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the Tongmenghui. Taking the forms of cartoon and photograph, they depicted and introduced the late-Qing officialdom, bizarre social phenomena, and Western scenes of life, serving the dual functions of revolution and lyricism. The modern "Shantou port" pictorial schema sought to enlighten minds, stimulate thought, and introduce Western artifacts, thereby propelling modern Chaozhou society toward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aoshan; literary images; Revolution and lyricism; Modern times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潮州文化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近代潮州报刊图像研究（1840—1919）”（GD22CZZ06）

作者简介：李国平（1989-），男，安徽马鞍山，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陈奕君（2002-），女，湖南株洲，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通讯作者：李国平，通讯邮箱：843987910@qq.com

www.shiharr.com

引言

近代西方铅石印刷术传入岭东沿海，刺激潮汕报刊业兴盛，产生政论、画报、白话报、期刊等不同类型传播媒介。从报业史视角整理近代潮汕报刊，阙本旭^[1]、曾旭波^[2]等学者已有研究。目前，学术界较少从图文叙事角度，分析潮汕地区报刊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探讨图文关系中的版面生成、刊印策略、艺术形态、社会功用等，仍需进一步深入。基于此，本文结合媒介变革、政治环境、读者阶层、侨乡地缘等因素，还原近代潮州报刊文学图像的真实发展风貌，探讨潮汕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轨迹。

1 近代潮汕报刊图像的发展概况

近代潮汕地区报刊业大体兴起于二十世纪初。1860 年开埠后，汕头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张，1884 年开通电报、1897 年设邮政局，商埠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报馆得以及时接收并转载国内外电讯、迅速将报纸运送至各代派处，潮汕报刊业迅速发展。据阙本旭、曾旭波等人研究，1889 年至 1919 年间潮州、汕头一带先后出现三十余种地方报刊，类型涵盖综合性日报、政论报刊、白话报、画报及行业性刊物等。^{[1]359-362}兹据省内馆藏，将近代常见潮汕报刊示目于下（见表 1）。

表 1 近代潮汕主要报刊图像一览表

报刊名称	创刊年份	发行时长	刊印方式	插图情况	馆藏地
《岭东日报》	1902	约 9 年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潮州白话报》	1903	约 1 年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鲗江公理报》	1904	短暂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潮声》（半月刊）	1906	约 3 年	铅印	少量	全国报刊检索
《双日画报》	1907	短暂	石印	大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新中华报》	1907	短暂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中华新报》	1908	约 3 年	铅印	较丰富	广东省立图书馆
《图画新报》	1909	短暂	石印	大量图画	汕大图书馆三楼特藏室
《揆华报》	1913	约半年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大风日报》	1913	约 1 年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公言日报》	1913	短暂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民权报》	1912	短暂	铅印	少量	广东省立图书馆
《汕头民报》	1914	约 5 年	铅印	少量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潮梅日报》	1919	10 余年	铅印	较丰富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说明：表 1 数据综合参考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曾旭波《汕头埠老报馆》、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整理而成。

潮州报刊文学图像的发行具有以下几点特征。其一，发行地高度集中。大多数报刊创办于汕头埠，并以育善街、外马路一带为出版中心，形成“以育善街、岭东阅报所为中心的报馆、报刊出版一条街”^{[2]3-15}。其二，创办时间集中于清末民初。1902 年至 1913 年是潮汕报刊的高

峰创办期,与全国维新、立宪、辛亥革命的思想浪潮同步推进。其三,报纸发行日期长短存在差异。从报刊流通来看,潮汕地区日报为发行主流,但因经费不足、政府查禁,多数报刊存活时间较短,只有《岭东日报》《潮梅日报》等少数刊物延续较久。《岭东日报》具有代表性,该报由倾向维新的杨源联合何士果、陈云秋、温廷敬等于1902年5月在汕头育善街创办,是“汕头有史以来第一家地方报纸”“粤东地区风行一时的报刊”^[3]。该报每期出八开白报纸四页,采用铅印,已具备稳定出版周期,编排体例颇具近代报纸规范^[4]。而在发行渠道上,潮汕报刊主要通过订阅、报馆零售、租借三种方式流通,借助粤东与南洋潮人商号传布至海外。1906年汕头报馆每日销报不过千余份,潮汕每五六千人才有一人买报,发行不畅的原因是读者文化程度有限以及方言障碍^{[1]361}。为应对这一困境,曾杏村、吴子寿等人于1906年创办白话刊物《潮声》,专用潮州方言刊发新闻、常识与文艺作品,发行量上升至两千多份。其后,又仿《点石斋画报》体例,于1907年创办《双日画报》,以石印图像辅助传播,进一步降低了阅读门槛。从表中来看,近代潮汕报刊图像的生成大致经历由石印过渡到铅印的过程,前期以石印为主,后期铅印普及后,《岭东日报》等综合性日报借助金属活字与锌版制图,将人物肖像、时事图像与商业广告纳入更规范的版面中。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潮汕报刊业兴起,与客家士绅文教密不可分。《岭东日报》主要由嘉应州、大埔县客籍知识分子主持,以杨源、何士果、温廷敬等报人为代表,陈云秋更是出资参与创办“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5]与接办南洋华文报纸《总汇报》^[2]。潮汕报刊创作势力,由客家、潮州人尾组成,加之新加坡闽潮侨商的革命党人。1903年秋冬,潮籍侨商陈楚楠、张永福合资,筹办《图南日报》,1904年春正式出版,此为南洋最早鼓吹革命的报纸^[6]。该报又翻印邹容《革命军》五千册,易名《图存篇》^[7]，“设法输入漳、泉、潮、梅各乡镇，分送士商各界”，林义顺亲自携千余册返潮州沿途分送^[8]。南洋革命党人藉印刷品与商船往还于南洋、潮汕之间，持续向潮汕本土输入革命论。

潮汕报刊画师与报人群体为报刊文学图像的兴起提供了有力支撑。客家士绅文教、潮人南洋革命、日英商埠资本在汕头一埠交汇，为报刊业提供物质条件与思想氛围的同时，孕育出兼承新旧两面的创作主体。例如，曾杏村曾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吴子寿于1909年任汕头自治议会副议长。曾、吴二人的合作贯穿清末十年潮汕画报史，先后合办《潮声白话报》《双日画报》《图画新报》，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参与丁未黄冈起义筹划。《双日画报》停刊后，吴子寿借自治议会副议长的合法身份再办《图画新报》，继续以图像为革命动员武器。这一群体属于接受革命思想、参与地方自治与公共事务的士绅型新式知识分子。而在画师之中，揭阳王逊较具代表性，他擅人物白描与花鸟，1909年应吴子寿之邀任《图画新报》图画主编。画师与报人虽得印刷技术之助，创作活动却处于政治高压之下。1908年清廷颁布《大清报律》，规定违禁内容者永远禁止发行。《双日画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挹华报》等先后因刊载敏感内容或宣传革命被查封，多数潮汕报刊寿命短暂，画师与报人遂转而以图像、以抒情、以历史隐喻完成政治表达。

综上，近代潮汕报刊图像的生成，系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石印过渡至铅印，媒介技术提供支持。其二，客家士绅文教、潮人、南洋革命党人，提供人才力量支持。其三，创作主体兼承新旧两面，具备文教资源。三大势力合谋，形成较独特的汕头文学图像样式。

2 报刊文学图像中的革命与抒情

近代潮汕报刊文学图像呈现出“革命”与“抒情”特征，前者诉诸政治讽刺，承担反清动员与立宪批判功用。后者则以花鸟肖像的文人画式样，延续旧日士绅的审美趣味。《图画新报》以石印画作见长，集中保存了清末潮汕的政治讽刺画，《岭东日报》刊载了大量商业图像与时政插图，以下选取代表性报刊图像试加分析。

2.1 政治讽刺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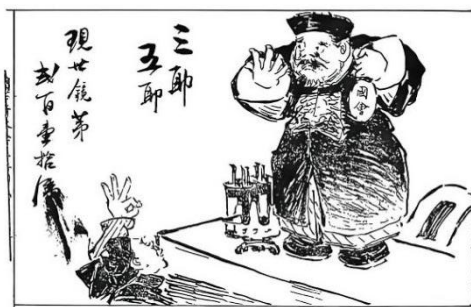


图1 《图画新报》宣统二年庚戌十月初五日“拜禮”栏目政治讽刺画

图一《三耶五耶》，出自《图画新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五日号“现世镜”系列。台上立一名清朝官员，左手持“国会”字牌，右手张开比作“五”；台下一人举手比作“三”。该幅插图下附论说《国家通论》，描绘出近代国家学说：“法人有人格则与国家以人格”“法人之人格为何？依国家之能力之范围以定”“法人之主体即此国家之权利能力。”^[9]国家作为法人具有独立目的与权利，民众非附属于君主之下，而系此法人的共同主体，以此区别于传统王朝的君主国家。单看《国家通论》文字，读者只能得知关于国家学说的抽象讨论；图像则把这一立宪议题落到眼前的政治时局上。所谓“三耶五耶”，问的正是开设国会的年限，是“三”，还是“五”。此图刊于宣统二年十月，恰值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立宪派于该年连续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定于宣统三年（1911年）召集；清廷迫于压力，遂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国会。图像借此讽刺清廷以延宕年限敷衍立宪，把允诺的“国会”化作空头招牌，其讽刺锋芒已超出对《国家通论》文字的图解层面。



图2 《图画新报》宣统二年庚戌十月十四日“拜禮”栏目政治讽刺画

图二出自《图画新报》“拜禮”栏目，时间为宣统二年庚戌十月十四日，配以论说《国会与自治》。画面中央为一名头部仰起、张开大嘴之官员，被塞入一个旋转九十度、横置入口的“理”字（“理”字以斜线条纹绘出，自其口中横入）。画面四周布列。论说《国会与自治》主张“开国会与办自治此二者皆国家之要业”，认为国会与地方自治相辅相成，二者并行方能真正落实立宪^[10]。其论说属士绅议政的立宪派立场，然这种文字批评传播仍受限于读者的文化程度。图像介入则打破此一限制，将“理”字所代表的“道理”“公理”“天理”转化为被吞食物体，塞入官员嘴中，所谓“缩短预备立宪期”的让步，在画面中被表现为被强塞、被吞下虚

假之“理”。讽刺官方主导的“立宪”，朝廷敷衍立宪的让步，使针对“敷衍立宪”的抗议得以面向不同识读层次读者。

2.2 花鸟抒情与历史人物



图3 《中华新报》新闻版面中嵌入的牡丹花鉴赏图

《中华新报》刊载“五百年前嶺海勤王之偉人”历史人物肖像（位于“嶺東紀聞”栏旁）

图三出自宣统三年《中华新报》，图像内容为一枝盛开牡丹。从版面上看，此枝牡丹被安排在时政新闻的中央位置，时政文字密集、字号统一，中央以白描线条勾出的牡丹则以留白与疏朗笔触出现，使版面整体更显舒缓。此枝牡丹采用工整白描技法，叶脉、花瓣层次细腻，呈现明清以来折衷于没骨与白描之间的文人画特征。它与周围新闻报道并无直接图证或图释关系，所承担的主要是版面缓冲与审美调节功能。将文人画风格之花鸟图像嵌入革命派报刊的新闻版面，颇能反映潮汕读者群体的文化构成。能够持续付费购读综合性报刊的读者，大体集中于士绅、商人与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一类，本身熟悉文人画与传统书画语汇，因而延续此种传统审美之版面安排，以吸引其购买。图三第二幅出自《中华新报》，刊登于该报“嶺東紀聞”栏目附近，标题为“五百年前嶺海勤王之偉人”。图像采用单线白描勾勒一位身着官服、戴乌纱帽、留长须的人物半身像，神情肃穆，目视前方，落款方框中以工整楷体书写人物身份。“五百年前”上溯至宋元易代之际，所绘者当为南宋末年率众抗元之岭海忠臣，即文天祥、陆秀夫一类人物。此图像属明清以来流行的历史人物追祀图。从画式上看，该肖像延续明清功臣像、先贤像之传统，正面或微侧的半身构图、严整衣冠、简洁背景，使观者注意集中于人物精神气质。从版面位置看，图四邻近“嶺東紀聞”栏目，该栏目所记多为本地政事与官府事宜。

选取勤王为人，兼具抒情与革命用意。就抒情而言，图像以宋末忠臣肃穆形象唤起读者对岭海历史的想象。明清以来潮汕地区原有崇祀宋末忠臣的民间传统，如潮阳莲花峰传为文天祥南撤时所至，这一民间记忆已沉淀为潮汕读者的集体情感，画像凭“五百年前”与“嶺海勤王”二标识暗含对故土先贤怀念，对应着潮汕读者文化身份中传统的、抒情的、向内之一面。就革命而言，1907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潮州饶平黄冈发动起义，名义统帅为同盟会任命中华民国军东军都督、潮安籍旅星侨商许雪秋，现场指挥则由本地革命党人陈涌波、余既成承担^[6]，经费、组织几乎全部来自新加坡同盟会^[7]。起义虽失败，却使粤东成为反清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同盟会系报刊《中华新报》在此前后刊登宋末勤王偉人画像，与本地革命氛围在时间、地理上形成对应，读者由怀念古人转向当下政治，由对岭海忠臣之追思自然延伸至对反清革命党人的认同。

《图画新报》图一、图二的发表时间均在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回顾此一节点，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起请愿，要求清廷提前召开国会，清廷遂宣布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至宣统五年（1913年）开国会。这一让步看似进步，实则被广泛视为敷衍，激起立宪派与革命派之双重不满^[11]159-161。正是在此种全国性政治情绪延伸之下，《图画新报》两幅政治讽刺画方得

以理解。图二张大嘴吞食“理”字之官员，与“国会速开年限短缩兹十五日停报一天用志庆祝”的相对照，构成对清廷政治诚意的质疑。图一台上持“国会”牌、比“五”之官员与台下比“三”之民众，则借“三耶五耶”的设问，含蓄地点出官僚国家与民众诉求在开国会年限上的冲突。两幅图所讽刺者具体明确，所指乃1910年立宪请愿失败此一特定事件，而非泛指清廷一般的腐败。《图画新报》的政治讽刺画，既属于1910年立宪运动遭遇挫折时地方报刊所发出的一种地方性批判声音，亦是标志立宪派失望逐步转向革命派的诉求。与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同类讽刺画一道，共同推动了清末舆论由立宪向革命的转向。值得注意者，《图画新报》本身亦由同盟会会员吴子寿、曾杏村主持，其编辑部即为革命党人的地方据点。该报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停刊，其图画主编王逊之笔锋亦由立宪讽刺逐步转向直接的反清动员，可视为这一舆论转向的具体见证。

《中华新报》刊载“五百年前嶺海勤王之偉人”画像，其历史针对性更为明确。新加坡同盟会能够有效动员潮汕本土，不仅在于1907年起义本身，亦在于早在三、四年前已完成的印刷品铺垫，新加坡《图南日报》及其翻印之《革命军》（易名《图存篇》）藉商船与侨批输入潮、梅各乡镇^[6]，林义顺等南洋潮籍骨干亲自携书返潮分送^[7]，使南洋革命派至本土起事时，已有现成的文字与图像基础可资动员。

值得指出的是，汕头《中华新报》此一画像并非孤例，它与新加坡《图南日报》1905年月份牌共享同一套宋元易代的反清图像。从《图南日报》创办、翻印《革命军》，至许雪秋发动黄冈起义，继之以《中华新报》刊载肖像一系列举措，可见南洋革命派报刊与潮汕本土报刊的同构性。这种以本土历史人物作为革命修辞的做法，与同时期上海、香港革命派报刊借助卢梭、华盛顿等欧美启蒙人物的做法形成对比。前者诉诸地方记忆与民族大义，后者诉诸西方启蒙思想。潮汕作为侨乡，其读者既包括本地士绅亦包括南洋潮人，本土历史人物对两类读者皆能产生共鸣，此或为《中华新报》采用此类图像的考量。

3 近代潮汕报刊文学图像的功用

近代潮汕报刊文学图像功用，约可由商业、文化、抒情三端见之。商业一端，见于医药广告所记跨域资本流转与本地药房代理；文化一端，见于图像随侨批、商船往还于潮汕与南洋之间，复见上海新式样经广州、香港东渐岭海之迹；抒情一端，则见于花鸟、肖像所延士绅旧学的审美，于政治高压、查禁频仍之际，转为一种文化政治表态。

3.1 商业功用

潮汕报刊图像的经济意义集中体现在医药广告类图像之中。如本文表1所示，《岭东日报》《民权报》等报刊刊载了大量医药广告图像。潮汕报刊广告承载三个层面的商业信息：其一，资本流动的跨域结构，日本、英国、上海五洲大药房等产品借厦门、汕头、潮州的口岸贸易进入粤东市场，潮州本地药房承担分销，构成国际货源与本地代理的商业链。其二，品牌转型，广告图像由中式传统图样到中西杂糅再到西式品牌主导，系近代品牌识别逐步成型的实证；其三，图像生产之工业化趋势，同一锌版在不同期号反复使用，反映印刷资本对成本与品牌识别度的考量^[12]。潮汕报刊医药广告图像系汕头开埠后本地工商业与跨国资本嵌入的见证，折射出近代东亚在商业流通中较少关注的侧面。

医药广告之于潮汕报刊，不惟充实版面，更系报馆维持经济命脉。前文论及，清末民初潮汕报刊每因经费支绌、屡遭查禁而寿命短促，汕头报馆日销不过千余份，订费所入有限。值此情形，广告收入遂成报馆周转要源，而医药一类利润既厚、复购又频的商品，尤为各报竞相争取。《岭东日报》《潮梅日报》等综合性日报得以维持较长的出版周期，与其稳定的广告版面不无关系。就此而言，报刊图像之商业功用，与报刊自身存续实互为表里。广告养报，报载图像，

图像复以其醒目反过来增益版面的招徕之效。医药广告于版面所占比重，几可视为衡量一份报刊商业化程度的标尺。

广告图像所列药品，其名目亦透露近代“卫生”观念的输入。例如，“真宝丹”以“起死回生”相标榜，人造自来血、鱼肝油、补汁之属则以补血、健身相号召，皆以强健身体为卖点。晚清以降，身体强弱每与国族盛衰相系，“强国保种”说流行一时，补血强身一类药品广告恰应和此风，将一己服药与种族强盛悄然勾连。如插图标举“日本药剂师隅田翁鉴方”，冠以“英国”药品之名，借东、西洋之声誉取信于读者，与同期政治论说之援引东西洋立宪、革命成例，恰可两相参看。也就是说，潮汕报刊医药广告所售卖者，不止是药，更以“卫生”“强身”，宣导开启民智的思维。

3.2 文化功用

潮汕报刊图像的文化功用则表现为跨域传播意义。潮汕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跨海而生的侨乡史，报刊图像也是跨海图文流通的载体之一。潮汕本土报刊图像随侨批、商船输送至南洋，《图南日报》《中兴日报》等海外报刊与本土报刊之间形成图像与文本的双向流通^{[1]360-362}。对于在南洋出生的侨人，报刊图像一定程度上塑造其对潮汕家乡的视觉认知，构成“纸上原乡”，是反映跨域意义的实例。近代图像新式样大致由1884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开创，继而通过商船航运、铁路通讯以及报业从业人员流动等方式，逐步扩散至岭南各地，1905年前后，广州出现《时事画报》《赏奇画报》；香港有《中国日报》；至1907、1909年，汕头始有《双日画报》《图画新报》大量采用石印图像^[13]。从图式上看，潮汕报刊在白描技法、医药广告图样等方面与上海图式存在明显借鉴，足见上海的新式样经由广州、香港等地逐步扩散至岭南东翼^{[11]159-161}。在借鉴上海图式的同时，潮汕本地画师又结合立宪危机与黄冈起义的政治氛围、士绅商人与华侨的读者构成，将上海图式作本地化处理，形成具有内在一致的“汕头埠图式”^{[11]159-161}。

潮汕报刊图像跨域流通，依赖侨乡特有的商业网络，如潮人商号、水路商船。一些汕头本地的画稿，可以随商货南下星洲、檳城，亦可经同一航路将《图南日报》《中兴日报》之革命图像携回潮、梅各乡。图像于是不止流向一端，而在原乡与侨居地之间往复，潮汕本土与南洋华埠遂藉此结成跨海的图文共同体。对于生于南洋、未必亲历故土的侨二代、侨三代而言，报刊图像所构筑的“纸上原乡”尤具分量。他们对潮汕的认知，相当程度上经由这些图像中介而成。而这一经由图像想象出来的故乡，一旦与民族大义、反清革命相接，便不复仅是乡愁的寄托，更可转为动员的资源。

3.3 抒情功用

商业与文化之外，潮汕报刊图像具备抒情功用。花鸟、肖像等抒情图像，不仅仅是为了审美点缀，且牵涉文化认同维系与读者情感。1905年同盟会成立、1907年黄冈起义、1908年报律之颁，一系列情境激发画工的讽刺笔锋，插图被附于“文以载道”图像旨趣。

抒情牵动读者情感，《中华新报》“五百年前嶺海勤王之偉人”一图最具代表性。画师择宋末抗元忠臣入画，表达明清以来，潮汕素有崇祀宋末忠臣的民间传统。潮阳莲花峰相传即文天祥南撤所经，此类民族记忆早已沉淀为地方社会的集体情感。图像藉“五百年前”“嶺海勤王”数字，唤起读者对乡邦先贤的追慕，先令其心生敬仰。报刊是一种情感的转接，它将读者对故土历史的眷恋，转化为对眼下政治选择的认同。于潮汕这一侨乡而言，本土历史人物既能打动本地士绅，亦能感召南洋潮人，抒情成为跨越地域、勾连古今的媒介，为革命动员预铺了情感基础。

1908年《大清报律》颁行，违禁者永远禁止发行，《双日画报》《中华新报》等报先后因刊

载敏感内容遭查封。画师采用直露的反清言论,风险极高,花鸟、肖像、文人画一类抒情图像,恰因其外表的“无害”,为报刊提供了一层保护色。一枝牡丹、一帧古贤画像,孤立观之不过寻常翰墨,官府难以据此入罪。其与四周时政文字、政治讽刺画并置,不动声色之间完成立场传递。故前文所谓花鸟图,于审美调节之外,实兼政治掩护。抒情图像使报刊得以在查禁的夹缝中存续,承载政治表达。抒情之于潮汕报刊,与其谓为对政治的回避,毋宁谓为政治在高压下的迂回,它以旧学的、向内的、看似无涉时局的面目,包裹起向外的、批判的、直指当下的诉求。

王德威关于近代抒情传统中谈到,中国近代抒情亦承担文化政治的功能^[14]。抒情作为诗艺与心声的结合,在国族危机之际常承载主体的政治判断与文化抉择^[15]。在政治高压、查禁频仍之际,画师与编者择工整白描的文人笔法入革命派报刊的新闻版面,是典型的文化政治表态。藉旧学审美维系本土士绅的文化身份,反向托起政治讽刺画的冲击力。所谓“由传统迈向近代的轨迹”,实际为近代借助传统而成型、传统经由近代而再生的过程。潮汕报刊图像所记录的“传统迈向近代”,是近代中国整体历史命题在地方中的一次具体演进。在远离北京、上海政治文化中心的岭海一隅,一群兼具士绅文教训练与革命政治认同的地方知识分子,将传统作为承载新政治、新观念的语汇,服务于读者群体的文化合法性。“汕头埠图式”由此成立,乃“以传统为材以容纳近代”的本土化案例。

要之,商业、文化、抒情三重功用并非各自孤立。商业流通供给图像以物质生存之资,跨区域传播拓展其流布的空间,抒情笔墨则在政治高压之下维系认同、转接情感、周旋于查禁之间。三者交织,方便近代潮汕报刊文学图像既能立足汕头一埠,复能远播南洋,于革命与抒情之间,留下传统借近代以再生、近代赖传统而落地的一段地方轨迹。

参考文献:

- [1] 阙本旭. 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J]. 图书馆论坛, 2005(6).
- [2] 曾旭波. 汕头埠老报馆[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3] 王琳乾, 邓特. 汕头市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4] 夏远鸣. 清末《岭东日报》的出版发行及其学术价值评述[J]. 中国出版, 2018(9): 63-64.
- [5] 杨妍, 李志贤. 论新加坡早期潮侨教育在地化: 以1930年代的端蒙学校为例[J]. 海外华文教育, 2013(2).
- [6] 冯自由. 革命逸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9.
- [7] 严春宝. 新加坡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2-08.
- [8] 刘绍唐. 民国人物小传: 第10册[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 [9] 图画新报[N]. 1910-10-05: 36.
- [10] 图画新报[N]. 1910-10-14: 77.
- [11] 王新锋. 在娱世与醒世之间: 近代岭南报刊图像景观探赜[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1).
- [12] 黄学佳, 沈丛升, 黄晓泳. 汕头107年前《岭东日报》展现代报纸风范[J]. 潮商, 2014.
- [13] 陈平原.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晚清画报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 [14] 王德威. 现代抒情传统四论[M]. 中国台北: 中国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1.
- [15] 王德威.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M]. 涂航, 等译. 中国台北: 麦田出版, 2017.